



著名散文家
梁衡
作序推荐

活了两辈子

樊云芳/著

青年时在流放地找到事业，
中年时从癌症中走出幸福，
苦难其实是人生最好的老师。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

活了两辈子

樊云芳 / 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时代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活了两辈子 / 樊云芳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212-05217-1

I. ①活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7819 号

书名: 活了两辈子

作者: 樊云芳

出版人: 胡正义

出版策划: 叶光森

责任编辑: 汤来先

特约编辑: 杨晶晶

责任印制: 刘 银

营销编辑: 赵秀彦

美术编辑: 陈喜艳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)

发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)

电话: 010-64267120; 010-64266769 转 8067 (传真)

印刷: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: 010-6125614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本: 695 × 995 1/16 印张: 13.00 字数: 21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5217-1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著名女记者
的别样人生



最深切的人生体悟
最感人的真爱咏歌

她前半生从“流放地”走出来，

后半生从癌症中走出来。

是的，没有人喜欢苦难，

但苦难却是人生最好的老师。

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相信并在追求着真爱与幸福的人！

序

面对不幸与灾难，笑比哭好 ◇丁炳昌

我与写这本书的那个人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，相知甚深。因此，读着这本小书，我发出了会心的微笑：像！

文如其人，书如其人。确实，这本小书是樊云芳的写照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过无数幸福的时光，但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过不幸与灾难。处于幸福中，樊云芳笑得很甜蜜，面对不幸与灾难，她虽然痛苦，但也会时不时绽出笑容，因为她一生的信条是：笑比哭好。

这本小书记录的，就是我们一生中两段灾难突然降临后的艰难岁月。

第一段是，1992年11月，樊云芳突然下身大出血，生命垂危，医生的诊断是“肠癌后期”。领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不到一年的她，在自己飞得最高时突然折断了翅膀，猝不及防地从生命的“顶峰”跌入了“最低谷”。之后是痛苦的手术、化疗……总算从鬼门关挣扎回来，但已经风采不再。很多朋友为她惋惜，为她担心：49岁的她将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？如何度过今后的岁月？

恐惧、忧虑、流泪、甚至痛不欲生——我们都经历过。但灾难既然已经降临、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，光是恐惧和流泪有用吗？

那天早晨，海军总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到她病房里，对她说：“初步诊断，你患的是直肠癌。”她听了一愣，然后就咯咯咯笑起来了：“你们搞错了吧，十年了，我没有报销过一张药费单子，自我感觉一直很好！请问，你们见到过这样的癌症病人吗？”

三天后，切片化验单出来了。她仔细看了单子，不做声。等医生走后，她转过脸来对着我，竟然又笑了——不过这一次是苦笑：“奇了怪了，我这种人竟然会得癌症……”

思索了几天，她想通了，她失血的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，反过来安慰

序：面对不幸与灾难，笑比哭好

我：“站在辩证法的角度，轮也该轮到我了——这些年我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但一个人不可能把好事占尽呀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进手术室前，她跟我约好：只要活着出来，就一定给我一个笑。我在外面立了6个小时。门开了，她被推了出来，脸白得就像床单。但她已经醒了，在用目光找我。终于找到了：就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她毫无血色的嘴唇裂开了，绽出了一个笑容——这个笑容是那么微弱，但却那么生动，永远绽放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几年后，彻底摒弃了“名记者”情结的她，选择回到记者站，当一个普通记者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个老太太变得越来越爱笑。早晨起床，听到阳台上两只鹦鹉的啼鸣，她会“咯咯咯”地笑；看到庭院里又开了几朵花，她也“咯咯咯”地笑；上网收到朋友的邮件，她边看边笑；晚上她进厨下面条，自己先尝一口：“呵呵，味道好极了！”自我欣赏的同时，笑得更开心……

那些事情在我看来都很平常，真不知有什么可笑的？真是个傻女人！但久而久之，我也开始跟着她笑。于是，平淡的生活中总是笑声朗朗。

我们这代人的命运，比起我们的上一辈知识分子要好很多很多了，但在改革开放之前，也有许多日子是欲哭无泪的。譬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“流放”到雁门关外的那段岁月。这也就是本书所写的第二大段。

1970年元月，我们两个生于黄浦江畔、长于上海的“臭老九”，结束了在河北一个军农场“再教育”的生活，又从滹沱河畔直接被发配到山西雁门关外的小山城浑源。我们心里如明镜一般：说是去进一步接受“改造”，实际上无异于“终身流放”。面对车窗外令人心悸的、近乎原始的荒蛮，不可知的命运，已经在前方隐隐露出狰狞面目……

在浑源，几个月见不到一片绿菜叶、一两猪肉，从县委食堂打回来的永远是水煮洋白菜与“傀儡”——一种玉米面与土豆混合制成的粗劣食品。同样令人难以忍受的，还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彻底“沙漠化”：终年没有电影，没有小说，没有音乐，只有鼓噪“大批判”的高音喇叭，每天轰响在人们的头顶。

但即便在那种时候、那种地方，她也能从灰暗中寻觅出几抹阳光，从愁苦中找出很多乐子，也能笑得“咯咯咯”地像只生蛋的母鸡。

记得那天深夜，她偷偷摸摸地，鬼鬼祟祟地，从浑源中学被封存的图书

室里偷回来一包书。一进家，就倒在炕上笑得喘不过气来——她笑自己，竟然有了做“小偷”的经历；她更笑自己“命太好”，竟然在这个偏僻、封闭的小县城里，能“偷”到一大堆世界名著！

“老天爷没有抛弃我们耶！”笑够以后，她盘坐在炕上，双手合一，虔诚地祷告：“老天爷，保佑我下一次、下下一次，还能‘偷’到这么多！不，不，是保佑我可以一直偷下去，直到……”听得我在一旁忍俊不禁，笑出声来。

一次，她跟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到黄花滩公社下乡，正遇上公社里杀一口猪，那年月大山区杀口猪不得了啊，周围村庄来了那么多垂涎欲滴的老乡，可剖开一看，全傻了眼：瘦肉层里排满了“米粒”，是典型的米猪肉！

米猪肉即患囊虫病的死猪肉，人吃了会得囊虫病：由虫卵孵化出的幼虫，会钻入肠壁组织，经血液带到全身，在肌肉里长出一个一个像米粒一样的囊肿，囊虫可寄生在人的心脏、大脑、眼睛，长在眼睛就失明，长在大脑会引发癫痫。

当下，那头病猪就在众人无限的惋惜与叹息声中，被深埋到了公社大院的后山下。但到晚饭时，小炕桌上竟然摆出了一盆香喷喷的红烧肉：原来是炊事员实在舍不得丢掉，偷偷留下的一块米猪肉。“没事的，我煮了又煮，煮了又煮，消毒了，嘿嘿，消毒了！”

红烧肉，被狼吞虎咽地消灭了。樊云芳也夹了一小块送进了嘴里。但饭后从房间里出来，她呕吐了——当然，偷偷摸摸不让任何人看到。

回来后，我一听她也吃了米猪肉，气得发抖，半晌才气急败坏骂出声来：

“你神经病啊！你无法劝阻，我理解，但你可以自己不吃啊！你！……”

她傻笑着，吞吞吐吐地：“我要不跟着吃，不显得我特别娇贵，惜命？”

“你！”我真恨不得上去给她一个大嘴巴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她居然还嬉皮笑脸地就地转了一圈，摆了个舞姿。

“不是现在的问题，弄不好十年后得了癫痫，或者瞎了眼……”

她扑上来捂住我的嘴，一边笑得“咯咯咯”的：“那等十年后再去发愁吧，我先过好了这十年，嘻嘻！”

她从背包里捧出了从黄花滩带回的十几颗干枣、三块柿饼子，献宝似的高高举过头顶，兴高采烈地逗我：“喂，你倒是吃不吃啊？不吃？我就全吃了！哈哈！”

看到她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我也没法再生气了，上去一把抢了过来，两人笑作一团。

笑比哭好，这是樊云芳的性格，是她的一种处世方式，也是她的一种人生观。

说实话，这本书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，里面没有宏篇高论，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，但每一篇、每一行，都是从作者的心底里自然地流淌出来，夹带着各种各样的笑声：欢快率真的、苦涩幽默的、痛快淋漓的、偷偷摸摸的、忍俊不禁的、苦中作乐的……

2011年10月19日

序

曾经有这样一代人

◇ 梁 衡

本书作者樊云芳是我在《光明日报》时的老同事，我与她又几乎是同时进的《光明日报》山西记者站——那是1978年之后，我们住在同一幢小楼里，门对门，整整五年。那时大家都才三十多岁，一晃现在花甲已过。

这十多年我们联系很少，一天她突然来电话，说要出书了，请写一篇“序”。

樊云芳是那个时期《光明日报》的名记者，许多作品得奖，她本人还曾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。因身体和年龄关系已淡出新闻界多年，怎么忽又想起出书呢？而且又要请故人作序。我看了初稿，涣然有悟。

我与樊是同一代人，我说的“同代”更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含义。即“文化大革命”中1967年、1968年、1969年这三年的大学毕业生。我们都是在“文革”前入学，即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，大学又已读完基础课，刚介入专业学习，就“文革”大乱。接着就被以专政对象（当时称“臭老九”：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右派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、知识分子，我们排在第九）的身份，发配到可以惩罚的地方，名曰“改造”。

我们这代人，比起上一代，要幸运得多，逃过了“反右斗争”，没有像数十万“右派”那样蒙受20多年沉冤，几乎被毁了一生；比起下一代，也要幸运得多，那数以千万计的小弟弟、小妹妹们，年仅10多岁便被中断了学业，遣送到边疆、农村去插队，很多时候连饭都吃不饱。我们这代人总是上过大学，即使被“流放”也还有一份工资，生活没有被逼到最后的绝路，而且又都报国心不死，形势稍一好转，就忙于各干各的事情，很少去说伤心往事。因此，在现在的各种文学与纪实作品里，右派文学有之，知青文学有之，唯缺写我们这一代。我们曾经历过的苦难，似乎被人们遗忘了。

其实，我们又如何能逃过“极左”横行的年代所酿造的悲剧？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，在我们身上，从肉体到灵魂，也无不被“极左”深深地划伤。

序：
曾经有这样一代人

当时我是被发配内蒙古的，比作者所在之地还要偏远。后来我进京在出版署工作，当时四川出版局的一位局长也是 68 届的，我和他谈及此事，他立即面容大变，不胜欷歔，接着讲了一段往事。当年他们几个大学生被发配到阿坝草原，一天出去拾柴，大雾，走失一人，第二天再找，只见一堆骨头，已被狼吃掉。几乎我碰见的每个“同代人”都能讲出几个这样的故事。本书里的第二部分《雁门关外的岁月》，就直接描述了作者所经历的这段在今天看来十分光怪陆离的生活。读着这些文字，我感慨良多，很多经历何其相似！作者的这种“拾遗补缺”，把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苦难，真实、生动地“复原”在大家的面前。

但我们这代人，又是始终保持着乐观、坚守着信念的一代。“文革”结束，我们这代人正值步入中年，一种紧迫感让我们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痛，来不及作更多的抱怨，就直接投身于改革大潮。就如作者在书里写的：

“了解中国国情，又饱尝生活的艰难，这使他们有别于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担的白面书生；十二年寒窗，又使他们有别于凭经验吃饭的‘大老粗’；‘文革’前后的亲身经历及其深刻对比，使他们清醒地思索着中国驶向现代化的曲折航程；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的精髓，又优化了他们的知识结构。他们是既能动笔动口、又能动手，在理论上开拓着新的思路，同时又脚踏实地、坚忍不拔的一群。”

但是，我们这代人的命运还有非常悲壮的一面：长时期地超负荷运转，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。有一个大学的“死亡档案”里如此记载：1982 年—1998 年，56 岁以上的老年知识分子死亡 6 人，而 35 岁—55 岁的中年知识分子却死亡 12 人，恰恰是一倍——这也是中国知识界那几年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。

樊云芳也不幸没有能逃脱这个魔咒。在 47 岁那年，她罹患癌症——其时距她获得首届范长江新闻奖仅 10 个月。在她飞得最高的时刻，突然折断了翅膀。

当我夫妇闻讯赶到医院看望她时，她已经在接受化疗。头发脱落，面色苍黄，给我的强烈感觉是：风采不再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为她惋惜，也为她担心：不知她能否承受住这个致命的打击？我还在猜测：当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时想了些什么？她将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？

今天，这些问题有了答案：本书的第一部分，就记录了她在“穿越死亡地带”日子里的心路历程，还展示了生命重启之后“脱胎换骨”的新人生。

是的，我们这代人曾长期接受“阶级斗争”的熏陶，思维、行为也都曾以“革命化”为荣。记得当年樊云芳只要一写稿，就对丈夫、儿子不管不顾，走进她的家，那真叫“家徒四壁”——不是经济拮据，而是不能“玩物丧志”！大病一场，死而复生，樊云芳铭心刻骨地体味了亲情与友情的可贵，体味了生命与生活的美好，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审视人生的真谛。于是，当她几年后复出“江湖”时，朋友们感觉她变了：不再像原先那样咄咄逼人，而是变得宽容、随和、淡泊了；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樊云芳，不仅仅是个记者，还是个善解人意的贤妻良母。

而这种人性的回归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。

了解历史，珍惜未来，愿今天的年轻读者能读懂这一代人！

2011年10月31日

丁炳昌 序：面对不幸与灾难，笑比哭好 / I

梁 衡 序：曾经有这样一代人 / V

第一卷 “第二辈子”
换了个活法

- 穿越死亡地带 / 3
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/ 14
妈妈为你们感到骄傲 / 32
岁数不是理由 / 46
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/ 61
永乐村 300 号 / 82
爸爸，你是一本我没有读懂的书 / 96
妈妈，请在天国等我 / 114
无法拒绝的黑眼睛 / 123

第二卷 雁门关外的岁月

- 雁门关外的绮丽风景 / 135
小县城求职记 / 144
在小县城结交的“人物谱” / 152
灰色岁月里的几抹阳光 / 167
第二所大学——“浑源新闻学院” / 180

附：樊云芳简历 / 193

第一卷

“第二辈子”换了个活法



引言

1992年11月中旬,《光明日报》一位副总编出差回到北京,急匆匆来到海军总医院,看望罹患了肠癌、明天即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。

他也是我的老同事、老朋友。谈话是推心置腹的。

“明天的手术,肯定是成功的,这一点不用担心。”他凝视着我的眼睛,直言不讳:“我担心的倒是手术以后。”

“手术以后?”

“我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:不是倒在手术台上,而是倒在过不了‘落差’这一关。”

“你想想,大病之后,你会有很长时间不能正常工作。从整天忙碌、好像哪儿都离不开你,到人去楼空、没有人再需要你;从风风光光,到无声无息;从事业的顶峰,突然跌入人生的最低谷——这落差有多大!”

“假如你无法面对这巨大的落差,假如你不能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那么,今后的生活对你而言,将是一杯不堪承受的苦酒,这是很现实的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,整天郁郁闷闷,从此一蹶不振。”

临走前,他语重心长:“面对现实吧,怎样走好后面的路,全在你自己啊。”

他的话,每个字都像一记重锤,敲击在我的心上。当天晚上,我失眠了。

其实他担心的问题,也正是很多朋友所担心的:樊云芳太要强了,她能否承受住这个致命的打击?47岁的她,将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?

说实话,就是我自己,当时也还没能想出个答案。

穿越死亡地带

当癌症突然“降临”、即将被推入手术室的那一刻，我羡慕所有能在街上漫步、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、能在小餐馆里吃饭、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。人们啊，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意识到，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？好好珍惜吧，好好品尝吧，就现在，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！

面对死亡，我留恋眼前的 每一片落叶、每一丝清风

那个面对死亡、同时也面对新生的星期天，虽然已经过去了11年又7个月，但今天回忆起来，每一个小时，每一个细节，仍历历在目，就如同发生在昨天——

北京。海军总医院大院内。寒风凛冽，落叶纷纷扬扬。丁炳昌牵着我的手，踏着飒飒作响的落叶，缓步而行。由于是星期天，院内人不多，我们绕着一幢幢建筑物，默默无言，走了一圈又一圈。这是1992年11月中旬的一天。

“回房吧，小心着凉。”丁炳昌温柔地劝我，但我执意要继续走下去。

纵然是共同生活了22年的丈夫丁炳昌，也难以体味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。是的，你还有无数个明天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散步、呼吸室外清新的空气，而我呢，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——结肠癌全切除手术。去有时，“归”无期，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。

47岁——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，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，再不能站起来，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、每一丝清风！

从早晨起，我就在生丁炳昌的气，因为他坚决不让我利用这手术前的最后一天上街逛一逛。“万一感冒了，手术就得推迟，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。”他重复着医生的话。

不错，可是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：我想再去理个发，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也要留下平昔满意的形象，有尊严地走；我想再逛一次大商场，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，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“闲情逸致”留给了“下一次”；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，那一片草地，那几株疏朗的灌木，那些欢欣雀跃、婉转啼鸣的鸟儿，曾多么地令我着迷；我也渴望随便进一家小餐馆，再品尝一次自己喜爱的鱼香肉丝，那股麻辣鲜美的香味，曾令我在异国他乡采访时魂牵梦萦……

所有这些，对他人是最简单、最平常不过的企求，但对我，都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我羡慕所有此时此刻能在街上漫步、能在公园里打太极拳、能在小餐馆里吃饭、能在商店里购物的男男女女。人们啊，当你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意识到，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和享受？好好珍惜吧，好好品尝吧，就现在，而不是等失去它们的时候！

为什么偏偏是我得癌症？ ——我问了自己一百遍

傍晚，护士为我灌了肠——因为明天的手术要求完全空腹。灌肠的药物让我感觉不适，不仅腹泻，且呕吐了数次。当晚，我感觉头晕，而且失眠了。

为什么我会得癌症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这个问题，我已经问过自己一百遍。在这黑幕沉沉、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在弥漫着来苏尔气息的病房里，我的思绪又一次牵向这个神秘的问号。

我素来很瘦，但体格强健，十年来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疗费；我

精力充沛，做事走路快得像一阵风，看书写稿经常通宵达旦；我性格豁达，爱说爱笑，遇到一点新鲜的事就高兴得叫起来。“这家伙不知道发愁，能活到一百岁。”丁炳昌对此羡慕不已——像我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得癌症？哪一条哪一款，符合医书上写的致癌原因？

于是我这样安慰自己：站在辩证法的角度，轮也该轮到我了。这么说吧，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占尽了——健康、荣誉、家庭、事业，这些年来我运气实在太好，周围的同事中兢兢业业者为绝大多数，但能像我这般色色皆备的，不多。冥冥中有一杆秤：这头得到太多那头就会失去。我失去的是健康，很公平。

我记者生涯中的成名作是长篇通讯《追求》。当初，我到病房里采访那个已奄奄一息的癌症病人栾葑时，从他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——那么微弱，那么绝望——让我的心不由得战栗：“一切都来不及了……”是的，他的满腹才华，他的全部理想，他毕生的奋斗，他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，都被极左的幽灵残忍地摧毁了，此刻，生命之火即将熄灭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与栾葑相比，我多么幸运！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，使我得以从山西省一个边远地区的通讯员，一步登天进入《光明日报》的记者队伍。接下来的十年改革，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，也是中国新闻界和《光明日报》最辉煌的十年。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，造就了一代名记者，作为其中的一个幸运儿，我做了许多想做的事，实现了许多愿望：天马行空的采访，一篇篇长通讯，出书，出国采访，获范长江奖，出席全国党代会……编委会甚至容忍了我的异想天开，特批我暂离记者岗位搞了两年科技开发。

中国有一句老话：“活着做遍，死了无怨。”如此看来，我应该很知足了，哪怕明天的手术台就是我生命的结束。可是，假如死亡就像进入睡眠，那自然好，可等待着我的痛苦万分的手术和化疗，那就像是酷刑，也许生不如死——这不容你选择，你怕与不怕都得去面对，就如当年江姐被捕后就必定要面对牢狱和酷刑一样。

当然这两者还是有根本区别：江姐面对的是毫无人性的恶魔，而我身边全是亲人、朋友和医护人员；恶魔要摧残江姐的生命，亲友医生是要